

基于奈达理论的文化转化策略和技巧

唐洁

(河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要:文学翻译是人类跨语言交际和跨文化交际的一种重要手段,由于文化差异和碰撞而不可避免地会在文化转化方面遇到难题。美国的尤金·奈达提出的一系列翻译理论对解决这方面难题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笔者着重就奈达的翻译信息论、对等论和读者反应论,详细探究了如何基于奈达理论并加以灵活运用,从而提高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转化策略和技巧,以更加完美地再现原文的艺术美与文化信息。

关键词:文学翻译;文化差异;文化转化;奈达理论

中图分类号:J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06)01-0050-04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交际活动,同时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通常意义上的翻译至少涉及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曾把语言比喻为文化这个有机体中的心脏。心脏固然重要,但它必须与机体相互作用才能使生命得以不断延续。她说:如同在做心脏手术时人们不能忽略心脏以外的身体其他部分一样,我们在翻译时,也不能冒险将翻译的言语内容和文化分开来处理^[1]。

翻译的根本任务就是促进具有不同文化和使用不同语言的人进行相互交流。各国文学作品是人们进行相互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文学翻译不再被认为仅仅是一种艺术手段,而且还担负了把外国文学作品介绍给译文读者的任务,具有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深入开展,外国文学译介工作日益繁荣,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不断涌现。文学翻译作为人类跨语言交际和跨文化交际的手段之一,其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一、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文学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艺术,揭示原文的意义内涵,展示其内在的美,而且是两种文化的转换,从另一种文化的角度阐释原文,传递原文的文化信息。各国文化中风俗习惯、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民族心理等等不同,具有很大的差异。文学翻译中由于文化的差异和碰撞而不可避免地会在文化转化方面遇到难题。

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掌握两种文化并始终考虑文化因素,是成功翻译的保证。通常来说,好的译者起码要通晓两种语言,掌握两种语言的语音、词汇、句法、修辞等方面的语言差异,但这还不够,还必须掌握两种文化,把原文语言信息中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充分并恰当地在译文中表达出来。实际上,翻译中的某些困难也常来源于文化上的特殊内涵。一篇反映某一独特文化中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行为习惯等的文本,常常含有其他的语言文化难以翻译也难以理解的内容。所以,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要充分关注文化因素,并在翻译上巧妙地加以处理,最终既表达出原文的风采,又符合译文读者的文化习惯。

另一方面,就某种程度而言,翻译过程中文化因素的作用与影响甚至比语言的掌握和技巧更为重要。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传统在思维感受和表达方式上的不同,不仅体现在语言的直接表达上,也体现在非语言性的间接表达上。那些不言而喻、隐含在字里行间的信息和内容以及翻译过程中对这些文化因素的考虑和处理,往往是译者处理原作、与译文读者相互沟通、理解并达到交流的关键。因此,文学作品的好的翻译势必要求译者在处理文化差异、进行文化转化方面,具有较高的策略和技巧。

二、基于奈达理论的文化转化策略和技巧

如何解决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转化难题,以有效地传达原文的信息和风范,达到交流和交际的目

的呢？

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博士是美国当代著名翻译理论家,也是西方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主要代表,被誉为西方“现代翻译理论之父”,其翻译理论在全球翻译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中国,奈达的翻译理论在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介绍最早、最多,影响最大。他的著作(包括合著)有近40部,文章200多篇。奈达提出的翻译信息论、对等论、读者反应论等对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转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一是翻译信息论。奈达和塔伯合著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以及奈达本人的《翻译科学探索》两部著作对翻译信息论作了详细论述。他认为译者可以“采用处理语言结构的科学途径、语义分析的途径和信息论来处理翻译问题。^[2]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相同。^[2]然而,由于一般译文读者理解原文的信息道往往会小于原文读者的信道,原文信息难于直接被译文读者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就必须“拉长”信息的表达形式,让原文信息与译文读者的信息道相适应,即让原文信息顺利通向译文读者。“这种拉长信息表达形式时,译者不能任意增加信息内容,而只是把原文那些‘不言而喻’的内隐成分转变为文字^[2]。

可以这样理解,翻译即交际,如果译文不能起到交际的作用,就是无用的译文。因此,文学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表现形式,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的交际不是直接的,译者为了全方位地传达原文的信息,并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信息,某种情况下不得不拉长信息表达形式。例如:在中国传说中,麒麟是一种神兽,身披鳞甲,具有乘风破浪、上天入海的神奇力量,还是一种祥瑞的象征。麒麟的形象具有广泛的亲和力,是中国文化和智慧的结晶。而对于国外的读者来说,麒麟还比较陌生,并不一定知晓并理解其文化内涵。日前在江苏南京结束的第十届全国运动会,组委会对外宣传中有这样一段话:麒麟为十运会的吉祥物,起名“金麟”又是“金陵”的谐音,体现了体育盛会的东道主——江苏人民的热情、开朗和友善,也预示着可爱的“金麟”将为江苏带来新的吉祥和活力。以下为作者译文:Kylin(a kind of divine animal with supernatural power and the auspicious sign in Chinese mythology), as the luck for the Tenth National Games with the name of “Jinlin”, the same pronunciations of “Jinlin”(another name of “Nanjing”, capital of Jiangsu Province), exhibits the warmth, uncloudedness, friendliness of Jiangsu people—

Amphitryon of sport festival and also indicates the lovely “Jinlin” will bring new luck and vigor to Jiangsu.作者在翻译上段文字时,拉长信息表达形式,对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麒麟和金陵做了必要的解释,使得国外读者获得与中国读者相同的等量信息。又如对于句子“望子成龙之心,天下父母皆然。”有如下翻译:Parents all over the world are longing to see their children become dragons, that is, be successful.这一拉长信息表达形式的翻译更容易被西方读者接受和理解。因为,龙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影响深远,而西方读者则认为dragon是一种邪恶的象征,会产生极大的误解^[3]。要全面传达以上中国俗语的文化内涵,必须拉长信息表达形式,把dragon在中国所“不言而喻”的内隐成分转变为文字be successful,那么西方读者才能够获得和中国读者相同的信息。

中国读者和西方读者的信道不一样,因此,在文学作品翻译时,文化信息的处理是很重要的。奈达的翻译信息论将信息通讯理论引入翻译研究,所提供的翻译方式非常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 and 不同语系的源语言和目标语言,能够为译者处理文化信息、解决文化差异难题提供方法论的指导。

二是对等论。奈达提出了翻译的新概念:“动态对等”。所谓动态对等,就是译文与原文在效果上达到对等,即译文读者的理解与感受与原文读者的理解与感受基本一致。与动态对等相对的是形式对等,即强调语言形式的对应^[4]。后来,奈达又对动态对等概念进行了修正和完善,改称功能对等。所谓功能对等,就是译文不但要求信息内容对等,而且尽可能地在形式上也要求对等^[5]。相比之下,功能对等比动态对等更具说服力。奈达在《语言、文化与翻译》中提出了翻译对等二层次。他强调,所谓“对等”分为“最高层次对等”和“最低层次对等”。最高层次对等指“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使目的语听众或读者在理解和欣赏译文时所做出的反应,与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所做出的反应基本上一致^[5]。最低层次对等指“译文能达到充分的对等,使目的语的听众或读者能理解和欣赏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5]。这是一种最基本的要求”,低于这一要求的译文就不可能让人接受^[5]。“所谓翻译,即是在译语中使用最贴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第一是意义,第二是文体^[2]。这三个重要概念:最贴近(the closest)自然(natural)和对等(equivalent)表现了奈达的翻译原则和态度。

根据奈达的对等论,两种语言阐释的同一文学作品,其语音、语法、词语等表达形式、文化背景以及

审美情趣各不相同,不可能绝对等值,但最终表达功能的相同却是可能的。译者应该做的,就是要研究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从而在意义和文体上找出最佳对等语,使译文最大限度地从内容和形式上贴近原文。

现以许渊冲译文和其他两种译文为例本来比较说明在文学翻译中,如果恰当运用或者暗合了奈达的对等论,就能够实现源语文化向目标语文化的转换,更好地再现原文的信息和艺术美。金昌绪《春怨》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此诗翻译“功能对等”的关键是“辽西”二字。诗中人物思念远在边疆战场的丈夫,欲在梦中与之相会。可惜黄莺叫,梦难圆,叫人怎的不恨。“辽西”的隐喻清晰明了:唐朝的兵役制度使百姓遭受极大的痛苦。据此,译诗须作变通,取其内涵。以下三种译法对后一句有三种处理^[6]

① Their chirping breaks my slumber through/And keep me from my dreams of you.

② When she dreamed that she went to Liao-shi/To join him there, they (the orioles) waked her.

③ Drive orioles off the tree /For their songs awake me./From dreaming of my dear/Far off on the frontier.
(许渊冲)

对比这三种译法,第一种译法不提“辽西”,从译文也看不出所思念者是何人,读者最多知道这是一首极普通的情思诗,原诗的社会意义有失。第二种译法直译 Liao-shi,却并没有解释什么,因为无注释“辽西”含义仍然不明,故能品味者不多。许渊冲译文用了 the frontier(边疆),该词在英语中暗含荒凉、艰险之义(功能对等),比起不译(信息缺失)或直译(形式对等)更好地传递了原文之意,最大限度地从内容和形式上贴近原文,达到高层次的对等。

三是读者反应论。奈达认为,翻译的服务对象是译文读者或译文语言接受者。评判译文质量的优劣,必须看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同时必须把这种反应和原文读者对原文可能产生的反应进行对比,看两者的反应是否一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好比进行市场调查,测验公众对市场产品的反应。对某种产品,不管理论上认为它多好,也不管它陈列时显得多么美观,如果反应不好,那就不会被接受。”^[2]

文学翻译作为不同语言和文化间交流的方式是为了达到一定的交际目标。在文学翻译中,必须关注文化差异,时时考虑到译文对于译文读者的可读性、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注重译文读者的反应,才能使译文在译文语言的文化氛围中获得最佳的效果。这是因为,文学翻译的直接服务对象——译文

读者是不能阅读原作的,所以,译文除了应该能够生动地反映原文语言、文化、故事等等,而且还要能在译文语言和文化背景下被译文读者理解、接受并引起共鸣和反思。这样的作品才称得上是一篇好的译文作品。

下面是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先生在美国旧金山圣玛利亚大教堂和平祈祷仪式上致辞的开场白:

原文:女士们、先生们、大主教:当圣玛利亚大教堂的钟声在低沉回响的时候,当我们手中的蜡烛在悠悠燃烧的时候,美丽的旧金山已经经历了一天的喧嚣,笼罩上了浓浓的夜幕,无边的灯海穿透了城市向四周蔓延,与远处太平洋波涛拍岸的搏击声融为一体,旷古的自然与旧金山都市的文明交相辉映,使人们油然生成的联想飘向久远。

译文:The most Reverent Archbishop, Ladies and Gentlemen: In this beautiful city of San Francisco, amid the candlelight, we pray for peace and for the victims of the outrageous atrocities and terrorism.^[7]

原文词语华美典雅,渲染氛围,通过开场的铺垫,表达出庄严肃穆的主导基调,符合中文的语言文化习惯,使原文读者产生了严肃的反应。译文要达到与原文一样的效果,必须符合英语语言文化的风格,简洁、明了、直观,才能够创造出庄严肃穆的氛围,使译文读者产生与原文读者一样严肃的反应。所以,上面译文虽然略去了原文中的一些词语,但译文在功能上与原文功能对等,使译文接受者与原文接受者产生了一致的反应,达到了交际的目的和高层次的对等。

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在英国广泛传播,反响强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讨论。为了把《简·爱》介绍到国内,我国的著名翻译家李霁野、祝庆英、伍厚恺等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中文版《简·爱》在我国读者中也引起过强烈反响。这些翻译家的译文暗合了奈达读者反应论的思想精髓,使得译文《简·爱》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下被广大读者理解并接受,再现了原文的信息和风范,也达到了高层次的对等。

三、结 语

当今世界,随着全球一体化和世界地球村的发展,国际交流日益广泛和频繁,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越来越需要进行相互交流和沟通并共享世界文明。作为跨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传播媒介和文化的双向交流的中介之一^[8],文学翻译为译入语国家的读者展现了新的天地,拓展了他们的文化视野,所起的重要作用有目共睹。

奈达理论,特别是翻译信息论、对等论、读者反应论这三种理论,给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为当代翻译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翻译信息论是将信息通讯理论引入翻译研究,对等论是创造性地将接受理论的原理引入翻译研究,读者反应论则将译文和原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反应是否对等作为衡量翻译的最高标准。它们为译者在文学翻译中实现源语文化向目标语文化的转换和处理文化差异,提供了翻译理论上的指导和翻译实践上的策略和技巧,意义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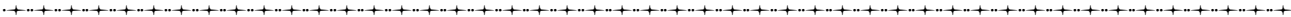
当然,对于奈达理论也存在不尽相同甚至相反的看法。如翻译的功能不仅仅是信息传递与交流;“动态(功能)对等”所强调的间译方法来自于《圣经》翻译,难免带上主观色彩,译者就应该如实地传达原文内容,而不能只顾读者的反应,等等。

所以,文学翻译实践中,在强调运用奈达理论处理文化差异的同时,还要根据翻译体裁、主题、风格、交际目的等因素,来精心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和技巧,以灵活地应用奈达理论,扬长避短,不断提高文学

翻译的质量,从而加快促进各种文化的交流与繁荣。

参考文献：

[1] SUSAN B. Translation Studies[M]. London :Routledge ,1994 :14.
[2] NIDA E A ,TABER C R. The Hist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Preface ,165 ,12 ,163 .
[3] 郑亚南.从语言看中西文化差异[J].南京社会科学 2001 (6) 66.
[4] NIDA E 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159-160 .
[5] Nida E A. Language , Culture , and Translating[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117 ,118 .
[6] 吕俊.谈诗词翻译中的意美原则[J].外国语 ,1995(5) :44 .
[7] 袁晓宁,刘成.关于翻译中归化和异化的哲学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1) 27-28 .
[8] 孙宁宁.文化视野观照下的翻译研究[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1) :106 .



(上接第 39 页)

布虚伪事实诋毁竞争对手的商品或服务来进行宣传。因此,商业诋毁行为相对于欺骗性商业宣传行为而言具有特殊性,是特殊的欺骗性商业宣传行为,两者在本质上是特殊规定和一般规定的关系。两者之间的竞合,在本质上是一般规定与特殊规定的关系。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在实践中应当优先适用关于商业诋毁行为的法律规定,以此定性和处罚。

但是,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业诋毁行为的行政责任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作为特殊的欺骗性商业宣传行为,按照特殊规定与一般规定的法理,则完全可以适用作为普通规范的欺骗性商业宣传行为来定性和处罚,以便有效地保护其他经营者和社会公众的基本权益,建立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这对于现行法律下的行政执法工作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三、结 语

综上所述,欺骗性商业宣传行为与商业诋毁行为存在规范竞合。这一竞合在法学理论上可以存在,同时也符合我国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定。

在经营者采取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方式来宣传或突出自己的商品或服务,导致消费者误认误购的情况下,则同时构成欺骗性商业宣传行为和商业诋毁行为,其中商业诋毁行为应当是欺骗性商业宣传行为的特别行为,适用普通法与特别法的相关理论。这不仅具有法学理论研究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能够指导目前的行政执法工作,有助于制止违法行为,保护其他经营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建立和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

参考文献：

[1] 种明钊.竞争法学[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115 ,180 .
[2] 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与完善[M].北京 :法律出版社 ,1998 :196-207 ,598-601 .
[3] 孔祥俊.引人误解的虚假表示研究[J].中国法学 ,1998 (3) 21-25 .
[4] 邵建东.竞争法教程[M].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3 :137-138 .
[5] 孔祥俊.公平交易执法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 :工商出版社 ,1998 :100 .